■ 大刀进行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气急败坏的敌人把赵绍久带到山坡上活埋。敌人边埋边用铁锹铲赵绍久,他的脑袋几乎被铲断,血肉模糊,仍高喊“打倒日寇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他就义后,其子侄怀菊、怀宣、怀枢、怀善、怀武、怀同等人又相继参加了革命。其中,赵怀菊、赵怀宣、赵怀善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

一门五烈士 英名撼山河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李灵丹 刘苗

邹平县青阳镇东窝陀村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子。村子看上去并不起眼,却是革命的摇篮,山上的一石一木见证着那段战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这里不仅有六七十人先后参加革命,更孕育出赵氏家族“一门五烈士”的悲壮故事。

农历三月初三,是东窝陀村三月三会仙山庙会,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听戏、拜庙、赶大集,热闹非凡。几经寻觅,记者在戏台前找到了正陪老伴看戏的赵氏家族后人赵德元老人,在戏台子后的空场里听他追述祖辈与父辈气冲霄汉的革命生涯。

“铁匠村”的铁骨硬汉

探寻这段历史,还要从这个村的历史说起。东窝陀村坐落于鲁中长白山脉之中,村里农民历代以在山地上种些薄田为生。山区靠天吃饭,遇到风调雨顺生计勉强维持下去,遭遇到自然灾害经常颗粒无收。生计的压力逼迫村民外出另谋生路,打铁成为村民的一种生计。解放前,全村有50来个铁匠炉子,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外出打铁,东窝陀村又被称为“铁匠村”。

东窝陀村铁匠,走南闯北见识广。在众多铁匠中,有一个人不仅技艺超群,还富有威望,他就是“一门五烈士”的关键人物赵绍久。据青阳镇史志办周丙玉介绍:“赵绍久是青阳镇最早的革命者之一,他开启了赵氏整个家族的抗战史。”

“赵绍久是我爷爷的亲兄弟,我爷爷排老四,他是老五,我得叫他五爷。”赵德元介绍,赵绍久,名承舜,字绍久,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弟五人中,大哥、二哥早年病故,三哥、四哥为人忠厚,只有赵绍久能言会事。他读过私塾,后因经商奔波于上海、天津等地,走南闯北,历经磨难,且又见多识广,深知贫苦百姓谋生之艰难,逐渐养成了刚直不阿、豪侠仗义的性格。

1932年冬,东窝陀村财主赵守玉得罪了官府,官差却错将贫民赵承玉逮去,受尽不白之冤,村民敢怒不敢言。赵绍久闻讯后,独自闯入公堂据理力争,迫使官府释放赵承玉并赔偿20元安慰金。这一义举得到了村民的赞许,赵绍久的名字在村民中无人不知,村里谁家有了难事都会找他帮忙解决,他成了乡亲们的贴心人。后来,有官吏在敛粮时假造大升,甚至一升合二升,也是赵绍久找到县政府民政科申诉,维护了百姓权益。此事之后,村民更加信服赵绍久。他领导村民组织穷人会,开展抗捐抗暴斗争,一时间穷人会发展到五六十人,为革命埋下了种子。

赵德元介绍,卢沟桥事变后,赵绍久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毅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民先组织,并担任民运股长。为了宣传抗日,他于1938年冬至1939年春,在耿庄主持创办了“长白山抗日小学”。学校在扩大抗日影响,广泛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初,赵绍久与邻村好友陈家庄的张香坡一起,被批准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按照组织指示,二人继续以“农会”的名义为掩护开展工作。农历二月中旬,八路军主力部队驻进陈家庄,委派赵、张二同志向各村的富户征收抗日捐。这一举动触动了各村地主的利益,他们对赵绍久、张香坡恨得咬牙切齿,就勾结反共顽固派的国民党伪六团,准备对赵绍久、张香坡下毒手。

一天,赵绍久去附近的徐家庄赶集,被早已设下埋伏的伪六团逮捕。敌人把赵绍久绑到刘家村,关在猪圈里,对他严刑拷打。先是用鞭子抽,后用烙铁烙,他的嘴唇、胸部都被烙烂了,但他宁死不屈,不向敌人泄露一个字。当天,张香坡也在家中被捕。

翌日,伪六团副团长高竹君将赵绍久和张香坡带到附近的张家洞村的山坡上活埋。气急败坏的敌人,边埋边用铁锹铲赵绍久,赵绍久的脑袋几乎被铲断,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赵绍久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5岁。

解放后,被公审的伪六团副团长高竹君供认,赵绍久就义前高喊“打倒日寇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不屈,视死如归。

革命之火代代传

抗日的烈火扑不灭,革命的志士杀不绝。

早在1939年6月,赵绍久就把三儿子赵怀柳和村里的三四个青年送去参加了八路军。赵怀柳随主力部队在鲁中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打了多次漂亮仗。

赵绍久就义后,其子侄怀宣、怀菊、怀枢、怀善、怀武、怀同等人胸怀国恨家仇,继承父辈遗志,又相继参加了革命。其中赵怀菊、赵怀宣、赵怀善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被追认为烈士,赵怀同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被追认为烈士,“一门五烈士”从此流传。

一门五烈士碑 (陈巨慧 摄)

赵怀菊是赵绍久四哥的次子,也是赵德元的父亲。据赵德元介绍,父亲赵怀菊1908年生人,1940年2月入伍,1941年3月发动陈家庄、化庄村、东窝陀村民众抗日,组织二乡游击中队,任中队长,队员发展到100多人,后编入长山独立营第三连。1942年春,赵怀菊调任机要交通员,在一次送信途中陷入敌人埋伏圈。

“80多个穷凶极恶的敌人将我父亲团团围住。敌人知道他携带情报,就想抓活的。他看到形势不利,抱定必死的决心,吞食了文件,与敌人展开激战。子弹打光后,他砸烂了手枪,拉响了压在胸膛下面的最后一颗手榴弹。伪连长跑上来一看,情报毁、枪烂、人亡,他什么也没捞到,气急败坏地朝父亲的遗体连开了好几枪。”赵德元说,父亲赵怀菊牺牲时,年仅34岁,那时他还尚未出生,是个遗腹子。

赵怀宣是赵绍久的次子,1940年10月入伍,曾在八路军清河军区清西分区二团任连长。1942年冬去机枪训练队学习,遇到日寇冬季“大扫荡”,训练队负责掩护军分区机关突围。赵怀宣冲出重围后,发现一位首长未出来,毫不犹豫地再次冲进包围圈。见到那位首长已经牺牲时,自己也被疯狂的敌人团团围住。他把机枪架在碾盘上,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子弹打光了,他砸碎了机枪,最后壮烈牺牲。

赵怀善是赵绍久大哥的长子,1943年2月入伍,曾在长山独立营任排长。1943年在明家集与伪六团作战时英勇牺牲,年仅17岁。

赵怀同,赵绍久大哥的三儿子也在解放战争中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赵绍久的英勇事迹,不仅激励着赵氏子孙为民族独立而奋斗,也感染着东窝陀村的热血青年。日本帝国主义惨绝人寰的扫荡,点燃了赵绍久建立的穷人会的革命火焰,全村有60多名会员参加了八路军。因都属赵姓,这些战士个个智谋双全、骁勇善战,多次击退日军的疯狂扫荡,让日军闻风丧胆。

“一门五烈士”英名传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曾经积贫积弱的东窝陀村如今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村,山峦环绕,绿树掩映,家家安居乐业,村民都过上了幸福安康的日子。但是,村民们不会忘记为此付出的代价,不会忘记这份幸福的来之艰难。作为赵氏子孙,赵德元更不会忘记。

“那时候,真苦啊!”说起往事,73岁的赵德元老泪纵横。“在俺赵家前赴后继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俺们家多次进行迫害。一次敌人冲进俺五爷爷家也就是赵绍久家,抢走了八路军藏在他家的全部物资,连家里的生活用品也全部拿走,接着毒打一家老小。俺五奶奶当时一棍子就被打晕了,可敌人还是不收手,就连他不满周岁的孙子,也被打得口鼻出血。敌人还拖出铡刀,叫嚣谁和‘毛猴子’有联系,就要铡死谁。在村里乡亲们的苦苦哀求下,一家人才幸免于难。”

赵氏家族先后参加革命的有8人,6人在战争中牺牲。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赵氏家族的男丁已所剩无几。“当时俺五爷爷家就只剩下妇女和孩子了,别的支脉上的几个大爷也相继牺牲了,为了生存,已经分家的赵家后人,又重新生活在了一起,我就成了家中的主力军。”

解放后,赵德元曾有机会入读设在淄博的山东省烈士子弟学校,但考虑到家庭对他的需要,便放弃了入读的机会。当记者问及他是否后悔过,“我感觉和俺赵家那些先烈一比,这都不算啥。现在俺赵家的后代都很争气,都在自己的领域作出了成就,没给先人丢脸。”说到这里,赵德元一脸的自豪。

赵德元告诉记者,其实赵家是“一门六烈士”,父亲赵怀菊的大哥赵怀枢,曾是东窝陀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兼民主政权的村长。1942年农历九月十六日,八路军长山独立营三连到二乡执行任务,计划夜宿东窝陀。赵怀枢负责筹集给养、安排食宿。

因叛徒告密,伪十一团得到情报后出动了一个团的兵力,连夜包围了东窝陀。三连察觉情况有变,及时改变计划转移他乡。赵怀枢因来不及撤离,仓促藏到了邻居家的井里。这口井里有个洞,曾经藏过游击队的人。敌人死死地盯上了这口井,一边喊话一边向井里打枪、扔手榴弹。见赵怀枢不出来,敌人就把点着的柴火掺杂红辣椒扔到井里,把赵怀枢活活呛死在井里。赵德元说:“赵怀枢的事村里的老百姓人尽皆知,但因为他在地方工作,未被追认为烈士,目前仍在追烈中。

为纪念先人,赵家子孙捐款10余万,修整了“一门五烈士”的墓地,并立碑纪念,碑文详细记录了赵氏家族烈士们的英勇壮举。中午时分,在赵德元的引领下,记者来到“一门五烈士”的墓地,绿树森森,烈士遗骨长埋于此。高五米的石碑竖立在最前,“一门五烈士”五个大字分外醒目,五位烈士的墓碑分别竖立在后面,记录着那段不寻常的历史,也警示着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 齐鲁名士

他任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期间,威海卫成为绝对禁烟区域;他公开支持抗日并赠送共产党武装部队枪支;卸任后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加入中国共产党。

孙玺凤治威

□ 陶遵臣

1936年,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目光移到威海卫,企图顺势把这片土地也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南京政府虽然加以拒绝,但也作了妥协——“嗣后威海卫地方行政,除仍属行政院直辖外,并受山东省主席就近督察。”并同意由山东省推荐一名本省官员担任未来的新专员。不久,孙玺凤赴任第三任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1936年4月至1938年1月任职)。在他担任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期间,严厉禁毒、支持共产党抗日,很快成为共产党的挚友,1946年1月由陈毅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司法部办公厅主任、国务院法制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

威海卫成为绝对禁烟区域

威海卫收回后,管理公署即开展禁绝鸦片毒害。公署决定首先废除英国人所允许的持证吸烟的做法,以及旧城内的许多大烟馆。

1936年4月,南京政府任命孙玺凤为威海卫管理公署第三任专员。到任后的第二个月,孙玺凤就颁布了“威海卫为绝对禁烟区域”,成立了以他为首的7人管理公署烟毒案件审判处。8月1日,成立了“威海卫禁烟事宜善后委员会”,由15人组成专门组织。确定“自本年8月至翌年1月底止,以6个月为期限,禁绝本区烟毒。”制定计划分为三期:自8月1日至31日为宣传期,以多种形式扩大宣传力度,使各区村民众家喻户晓,深刻了解烟毒之祸害,以促烟民之觉悟。自9月1日至30日,为烟民自动戒瘾时期,予以自动戒绝之机会。自1936年10月1日至翌年一月底至,为勒戒时期,分批传戒,强迫执行。一边饬令各区长村董,依法严密检举,不得稍有隐徇,一边举行各村各区烟民抽调法,使吸食烟毒者无所规避,以期收完全禁绝之功效。

为此,管理公署利用各公共场所发布宣传画、告白书等,号召烟民免费到戒毒所戒除烟瘾,并发布公告:如继续吸毒者,至1937年1月1日起,捉住一个就枪决一个,决不姑息。同时责成各村村董,进行检举揭发。孙玺凤自1936年8月17日起,亲率属员赴羊亭、田村、桥头、鹿道口及市内民兴舞台,召集群众大会进行禁毒宣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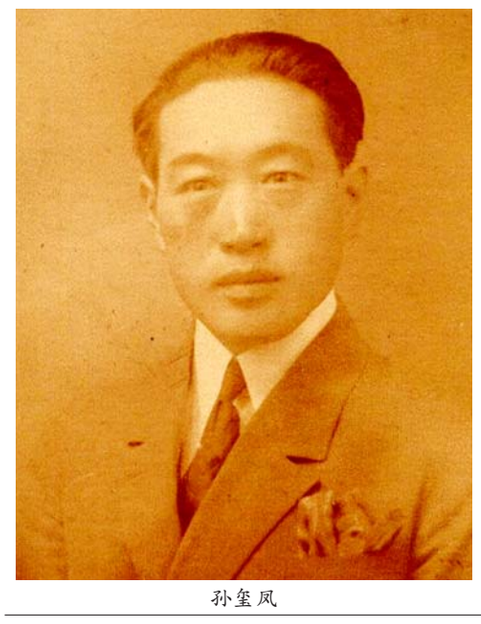
1936年8月21日《黄海潮报》发表题为《孙专员昨在温泉汤召开禁绝烟毒大会》的报道:吾威自孙专员到任后,对于烟毒两项,务期禁绝。盖以烟毒之害,足以倾家丧身,亡国灭种。因此连日不避风雨,召集各区长村董及民众等,开会宣传。俾家喻户晓,悬为厉禁。前日在急风暴雨中犹赴羊亭开会,足证孙专员对禁绝烟毒以下最大决心。昨日上午七时许,又偕公署陈科长、公安局张课长、孙会长、商会刘主席、党部胡委员等,乘汽车赴温泉汤,召集五、六、七、八各区长及村董民众开会,宣传烟毒之危害。八时许到达,九时开会。由孙专员主席致训词,略谓烟毒危害之烈,尽人皆知。务期在最短期内,彻底肃清。现在法令森然,盼各民众万勿尝试云云。到会者有第五、六、七、八四区长及二百余村董,数千民众。听者无不动容。公安局第二课长张国航,讲解禁烟禁毒条例,颇为详尽。商会刘主席等相继演说,大意均为规劝烟民决心戒除嗜好云。摄影散会后,孙专员复依次传见各村董,殷殷垂询国民大会选举公民登记事,各村董知孙专员关心选政,对答极为详尽。

全区所有登记烟民851人,自8月1日宣传禁烟后,纷纷赴威海卫禁烟事宜善后委员会呈缴登记证及临时吸烟执照,以便注销,均经分期戒绝。未登记的烟民,经各村董检举勒戒者,计有205人,共计烟民1056人,业已分批勒戒戒绝。

此后,对逮捕的贩毒、吸毒者,处以罚金或刑罚,罚金最多达千元,最少者3元。在公署一楼东廊楼内设审判处,孙专员亲自提审犯人,每审必令法警在走廊护栏内施以板刑。

1936年10月1日,将没收的毒品632375两,海洛因、吗啡5649两,烟具、注射器等170件,在公署办公楼前集中焚毁。至年底,被处以罚金者计245人,被判以刑罚的计1041人,其中贩毒犯孙开之、马洪奎、戚信先、戚和义、张吉正、丛学礼等6名,吸毒重犯高振东、张文清、刘德昌等12名被处以死刑;被判无期徒刑者1人;被判有期徒刑及被拘役者357人。凡有劳动能力的被拘役者,每两人中间串联一条铁链,让其在市区街道上清扫垃圾,以儆示民众。

威海卫特别行政区管理公署专员官邸


孙玺凤

孙玺凤夫妇携幼女摄于威海卫专员公署院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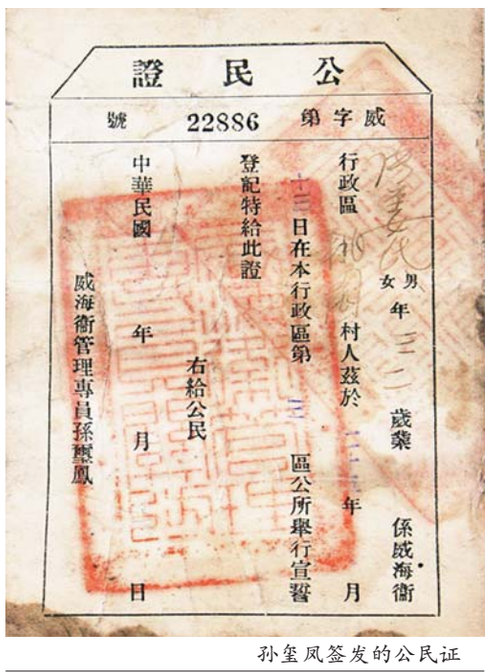
公开支持抗日

1937年10月,山东省“民先”队部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派出一批“民先”队员到各地开展统战工作,省“民先”队员孙明光因其胞兄孙玺凤在威海任国民党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专员,便到威海开展工作。孙明光到威海卫后,很快与中共胶东特委取得了联系,并利用自己是专员弟弟这个有利的身份,活跃在威海中学、海军教导队和国民党威海政训处,公开宣传抗日。

1937年11月,胶东特委派特委委员林一山到威海开展统战工作。林一山同孙端夫、袁时若、赵冶民、郝道逵等“民先”队员取得了联系。林一山经孙明光的引荐与专员孙玺凤进行了几次谈判,代表胶东特委向孙玺凤提出了发动威海起义,共同抗日的主张。孙玺凤表示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在此形势下,胶东特委当机立断,决定争取海军教导队中立和支持武装起义,孤立和监视郑维屏的公安警察部队,联合孙玺凤和一切爱国力量,于1938年1月15日举行威海起义。

上午9点多钟,起义部队集结到了管理公署,胶东特委书记理琪与孙玺凤作最后的谈判,孙玺凤愿意把公署仓库的100多支枪支、军事装备交给起义部队。起义当天,孙玺凤集合他的部下和卫队的官兵开会,对他们进行最后一次训话,训话结束时,他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孙玺凤签发的公民证

威海起义的成功极大震慑了反动势力,1938年9月,起义部队与掖县三支队合编,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从此,这支部队愈战愈强,为胶东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组织抗日武装加入共产党

威海起义当日,孙玺凤综合考虑,决定带着印鉴和公款取道香港,去武汉向国民党政府辞职。

1939年5月,孙玺凤到香港后,在香港跑马地山光道四号四楼设立“威海卫管理公署驻港办事处”。1940年10月,办事处迁往重庆南纪门内蔡家石堡维新街五十号,更名“威海卫管理公署威海区保安司令部驻渝办事处”。

1940年8月,威海卫抗日民主政府——威海卫行政办事处建立,管理公署遂名存实亡。1942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第588次会议决议,撤销威海卫管理公署。

孙玺凤到达重庆不久,就回到家乡高苑县(今高青县)组织起100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该队伍1940年合并到清河(后为渤海)军区。孙玺凤后历任清河地区参议会参议长、山东省参议会驻会委员、山东省法律编委会主任等职。

由于孙玺凤思想进步,并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1946年1月,由陈毅同志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司法部办公厅主任、国务院法制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1961年1月,病逝于北京。